

慈善的高山厚土

CISHAN DE GAOSHAN HOUTU

李玉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为我国慈善会发展的一个见证人，一个对慈善事业充满敬畏之情，为慈善领域的人和事激励感动，魂牵梦绕的编辑、记者、作家，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所了解的那些慈善会里的离退休老干部为人、做事的真实故事介绍给读者。



慈善的高山厚土

李玉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善的高山厚土 / 李玉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087-5132-0

I. ①慈… II. ①李… III. ①慈善事业—概况—中国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7514号

书 名: 慈善的高山厚土

著 者: 李玉林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李 浩

策划编辑: 孙武斌

责任编辑: 杨 非

责任校对: 苗俊杰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 话: 编辑室: (010)58124841

销售部: (010)58124848

传 真: (010)58124856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中国社会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印刷装订: 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2.00元



中国社会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序 言

慈善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李本公

打开《慈善的高山厚土》，我们看到的是对16位慈善会长的介绍。他们中有中华慈善总会的三任会长和几位副会长，有上海、天津、陕西、河南等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在我国大陆创办慈善会的首任老会长，还有山东、江苏、甘肃、北京及宁波、福州等省市的慈善会会长。这16位会长大多是担任过重要职务的省部级离退休老干部。

与慈善有着不解之缘的作家李玉林，从事慈善宣传工作多年，与这些老会长有过长期接触，对他们做慈善工作有着深入了解。在这本书里，他对这些慈善会会长的介绍真实生动、细腻感人，不但有这16位慈善会长为慈善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也有他们为人处世的生动细节和他们在领导岗位时施政为民的所思所为。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钟情于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无私奉献自己智慧和精力的美德。慈善事业的创建和发展需要众多无私奉献的拓荒耕耘者，这16位老会长和本书没有写到的许多为慈善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就是这样的拓荒耕耘者。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慈善”曾经被回避、曲解，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正名。春风化雨，慈善之树以茁壮的生命力重新扎根、萌芽、成长，如今已葱茏繁茂，遍布中华大地。

中华慈善总会创立的时候，我国现代慈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首任会长崔乃夫同志和大家一起，不但确立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生命力很强的慈善救助项目，而且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创研出重要的理论成果。阎明复会长与崔乃夫会长是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办者，是在中华大地重新举起慈善旗帜的带头人。阎明复任会长期间，经历了张北地震、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嫩江流域特大洪水等自然灾害。他和大家一起，为中国慈善组织在特大自然灾害中发挥积极作用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扩大了我国慈善组织与海内外慈善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在范宝俊会长主持中华

慈善总会工作的十年间，我国慈善事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范宝俊会长和大家一起，在紧急救灾、款物筹募、项目管理、对外交流、新闻宣传、自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创新性的大发展。书中对中华慈善总会三位副会长阎颖、黎子流、李宏塔的介绍文字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他们的描写都有生动、真实、感人的细节，读后令人难忘，也令人感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铁迪、天津市慈善协会会长陆焕生、陕西省慈善协会会长徐山林与河南省慈善总会会长李志斌都是我国最早一批在省市创办慈善会的创始会长，而且都是连任几届的老会长。他们不仅为推动本地区慈善事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他们的慈善理念与实践对全国慈善事业的推进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书中在对陈铁迪会长、徐山林会长和北京市慈善协会张燕丽会长的介绍之后，还附有他们写的“慈善一日”的文章，从那些朴实、生动的文字中，从他们一天的慈善工作与思考中，不难看出他们对慈善事业倾注的满腔热血，摘录的文字虽然不多，但分明是一种珍贵的慈善记录。山东省慈善总会和江苏省慈善总会成立时间虽然相对晚一些，但他们都创造了慈善事业发展的奇迹。这自然与慈善事业环境的发展变化有关，但同样与谢玉堂、俞兴德两位会长的突出贡献密不可分。书中对甘肃省慈善总会会长杜颖、宁波市慈善总会会长项秉炎、福州市慈善总会会长方庆云等三位会长的介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三位会长为慈善事业的贡献和他们的为人品格同样为人称道。

慈善会的许多老同志都是以慈善为生命的人，是积极奉献、埋头苦干的人。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仁者爱人”的传统美德，同时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和做法，身体力行，勇于创新，以优异的成绩融入慈善之林并得到同行的认同和信赖。他们是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先行者。他们的成就自然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同时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我们后来人的呼唤，呼唤我们继往开来，甚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回顾我们共同走过的路，我们会得到一种动力：只要我们坚决执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示，努力工作、廉洁奉公、大胆改革、锐意创新，我们就会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更大成绩。

（本文作者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

目 录



中华慈善总会首任会长 崔乃夫 P03

中华慈善总会第二任会长 阎明复 P33



中华慈善总会第三任会长 范宝俊 P98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第一、二、三届理事长 陈铁迪

P155



天津市慈善协会第一、二、三届会长 陆焕生

P173

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副会长 阎颖 P181



中华慈善总会第二任副会长 黎子流 P185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李宏塔 P190





陕西省慈善协会第一、二、三届会长 徐山林

P197

河南省慈善总会第一、二、三届会长 李志斌

P206



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 谢玉堂

P221

江苏省慈善总会会长 俞兴德

P242



甘肃省慈善总会会长 杜颖

P255

北京市慈善协会第二届会长 张燕丽

P270



宁波市慈善总会第一、二届会长 项秉炎

P280

福州市慈善总会会长 方庆云

P290



引言

2013年9月19日晚上，我去看望中华慈善总会老会长阎明复。交谈中，阎明复会长高兴地拿出中华慈善总会2004年出版的一本画册，一页页翻看，并高兴地和我谈起慈善会那些老同志。这时，一旁一名比较年轻的同志说：“阎会长可能还不知道，网上有人把慈善会说成是老干部的俱乐部了！”

老会长没有抬头，没听见似的，依旧饶有兴致地回忆着、述说着那些慈善会老同志为慈善事业发展付出的努力、作出的贡献。他依旧颇具感染力的声调中此时多了一种能触动人们心弦的情感，一种会使人眼眶发紧、眼圈发红的情感。

我一边听一边想，只要能面对事实、尊重事实，只要多少有些社会责任感，心和眼睛没有被腐蚀污染，没有哗众取宠之心的正常人都会看到、了解到：正是慈善会里那些离退休老干部无私奉献的精神、改革创新胆略、呕心沥血的工作，才有了新中国慈善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他们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奠基者、开创者，是中国慈善的高山厚土。这是中国慈善会发展历史不容抹杀、不容歪曲，也抹杀不了、歪曲不了的事实。

作为我国慈善会发展的一个见证人，一个对慈善事业充满敬畏之情，为慈善领域人和事激励感动、魂牵梦萦的编辑、记者、作家，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所了解的那些慈善会里的离退休老干部为人、做事的真实故事介绍给读者。

当我们看到我国慈善事业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发展，当越来越多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士加入慈善工作者队伍的时候，我们绝不应该忘记那些为我国慈善事业作出了非凡贡献的老同志。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政部任部长11年，1994年至1998年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

中华慈善总会首任会长 崔乃夫

慈善，这个曾经被回避、曲解，甚至被鞭笞的名词在新中国被正名被重新提起；慈善事业在新中国重新酝酿、萌芽、创建、发展；慈善的旗帜在华夏大地重又举起并越来越高地飘扬，这曲折却令人振奋和欣慰的中华慈善史都与崔乃夫这个厚重又响亮的名字紧密而生动地联系着。

2014年，崔乃夫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却风度依然。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这位共和国部长、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又总能使人从心底里感到一种力量，一种颇具震撼力的启示。

早在1995年，我就在他位于北京西皇城根9号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过慈善。那时，我对“慈善”还懵懵懂懂。

“怎么解释慈善呢？慈善实际上就是人们之间的互助。作为

观念来讲，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是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老子的《道德经》中，又有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样的句子。”崔乃夫坐在他办公室一张放了许多书的小圆桌旁，一边轻轻用手比画着，一边流畅而清楚地对“慈”和“善”作了分别的解释。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体现的就是慈。善讲的是横向关系，社会上人对他人的帮助、仁爱。中国把‘慈善’二字并提，是在《北史·崔光传》里。那里面有‘光宽与慈善’这样的提法。”

那个上午，我还听到他对我国慈善事业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慈善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福利救济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应该由国家包起来；二是有些人认为慈善活动是伪善，是有钱人从他们剥削他人的钱财中拿出一点施舍穷人。崔乃夫说，这是我国慈善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发展的思想上的原因。另外还有物质上的原因，这是更重要的。我还记得那时崔乃夫有声有色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经济情况，他用手比画着说：“那时，每人每月28斤粮票、5两油、半斤肉，一年十几尺布票，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开展慈善活动？”接着，他又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他说：“现在，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有了落差，也就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不少人也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慈善、能否成立慈善组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从国家到老百姓都认识到：事事全靠国家是不行的，还要靠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援。”

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总是不断听到崔乃夫有关慈善事业的深刻论述，逐渐了解、体验到他在任民政部部长和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期间为我国慈善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崔乃夫对我国的慈善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进入古稀之年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童年时代所见到的与“慈善”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时，他还不满10岁，有一年他的老家昌平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

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涌入北京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也成了他热衷慈善事业的历史渊源。崔乃夫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他1947年在中法大学学习，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30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民政部，当了11年的部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满怀对党、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时代的真挚的爱。

1985年崔乃夫提出并在民政系统实施了民间捐赠旧棉衣被给贫困乡村的举措。崔乃夫的贡献与他具有很强的改革创新意识分不开，担任部长期间，他对中国的民政事业作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包括农村扶贫、养老、救灾救济、残疾人的福利企业、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农村养老保险等方面都有创新性的发展。他常常深入基层，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就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而慈善事业，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是很自然、很简单的事，但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国家脸上抹黑，

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还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

20世纪80年代，崔乃夫在全国民政工作的实践中看到，一方面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民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民政工作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崔乃夫计算过，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每年大约还要增加20亿元的民政资金。他很清楚，国家建设需要资金的地方很多，眼下是不可能增加这笔民政投入的。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1986年4月，崔乃夫向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提出在全国发行福利彩票的意见。那之后不久，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国务院。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独家发行，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会议还决定，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也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

中国第一个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引起的波浪。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也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

举。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91年，我国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自5月下旬以来，天气异常：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少有的连续数月的阴雨天气，降雨量是常年的2-5倍。而西北、华北、华南地区旱情严重。面对这种形势，崔乃夫寝食难安。他安排救灾司的同志密切关注灾情的发展，及时向国务院汇报，组织各省民政力量，紧急转移安置灾民，并为灾民发放食品、衣物。

当时江苏省民政厅及时将当地受灾情况比较详细地汇报上来了，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安徽的情况却还不甚明了。崔乃夫要求救灾司即刻安排人员到安徽考察灾情。6月12日，救灾专员史怀恩和救灾司办公室主任蒋传高乘火车从北京赶往安徽东北部的蚌埠。一般情况下，北京到蚌埠本来只有8个小时的路程，但他们却走了3天3夜。途中，他们已经开始亲身体验到大水造成的破坏了。沿路的一些地段的铁路铁轨已经被冲毁，他们走走停停，走的时候一直紧盯着车窗外被大水浸泡的农田；停的时候，他们就下车，体验暴雨造成的危害，了解当地受灾群众的生活情况。

得知民政部派救灾专员到安徽考察，安徽民政厅委派丁四金到蚌埠火车站接站，并陪同民政部的同志在灾区考察、慰问。多年之后，丁四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他们于6月14日下午从合肥出发。当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他们乘坐的北京吉普，仿佛一叶冲锋舟冲过一段段被水淹没的公路。车行至凤阳门台子时，前方几十米长的路段水深流急，吉普车排气管进水，突然熄火趴窝了。车子随时有被水冲走的危险，他们急忙跳下车救急。路两旁的群众得知丁四金这位个子不高、身体单薄、浑身湿透的同志和车上的人顶风冒雨，不顾危险，为的是安徽救灾大事，即刻呼朋引伴，纷纷下水，将车子推上了高处的公路。这时，天黑雨急，车子依旧发动不了，那时没有手机，更没有现在的电脑，无法与外界联络。无奈之下，他们拦下一辆大货车，连人带车拖到蚌埠，这才如期接到民政部派来的救灾专员。

在火车上3天3夜，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的史怀恩、蒋传高与在大雨中奔波了一夜的丁四金一见面就立马谈起了安徽眼前的水灾。他们其实都很累、都很饿了，只是没有觉察罢了。细心的丁四金急忙在路边找到一个餐馆让一行人简单、匆忙地填饱了肚子，而后没有片刻停歇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灾区考察、慰问。他们从蚌埠市郊开始，经五河、怀远，到蒙城、阜南、颍上。他们看到，田野里尚未来得及收割的麦穗成片成片地倒伏发芽，公路上翻晒的麦粒已经发霉变黑。淮河水翻滚的波浪里，一堆堆麦垛起伏跌宕，还隐约可见趴在麦垛上惊恐万分的鸡鸭蛇蛙，不时有已淹死的牛羊猪禽顺流而下。他们看到，许多村民的房屋在大雨和洪水的冲击、浸泡中倒塌了，一些学校也被洪水淹没，孩子们无法上课。安徽的10个行蓄洪区当时已经启用了5个。面对这异常严重的灾情，史怀恩、蒋传高十分震惊。第三天，他们在丁四金的带领下，抵达灾情十分严重的阜阳。当夜，史怀恩、蒋传高和丁四金等省民政厅的同志研究对策。他们说，没想到安徽的灾情如此之重，损失如此巨大。史怀恩说，依他多年的查灾、救灾的工作经验，灾情还会继续发展，很有可能要发生多年未遇的大灾。他说：“我们必须连夜给民政部起草报告，以引起高度重视，做好救大灾的准备。”史怀恩的语气充满了焦虑和担心，他们的心中都沉甸甸的。说干就干，史怀恩、蒋传高口述，丁四金往电报纸上誊写。他们当时落脚的地方没有传真，史怀恩签发后就以特级电报的方式连夜把报告发往民政部。

崔乃夫很快就看到了这份报告，他立即上报国务院，并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救援。

这次水灾涉及18个省份，灾情最严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当时的淮河大堤上，还有200多万无家可归的受灾群众正在那里遭受灾难的煎熬。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华东灾情，江泽民、李鹏、田纪云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深入灾区，视察灾情，部署抗洪救灾工作。成立了由田纪云同志任组长的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增加救灾拨款。在谈到这一年的救灾工作时，崔乃夫特别强调“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田纪云副总理的贡献。“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是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于1989年成立的。田纪云副总理任主任委员，崔乃夫任副主任委员。其宗旨是通过各种努力，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这时崔乃夫意识到应当发挥这个组织的作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救灾。这个建议得到田纪云副总理的全力支持，并责成民政部副部长、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崔乃夫认为这是一项重大突破。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我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被动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中国政府面向民间、面向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得到了及时热烈的响应。

崔乃夫很难忘记当时那些感人肺腑的场景。全国各地各族群众、各级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心系灾区，情暖灾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同时广泛开展义演、义卖、义诊等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捐赠热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风雨同舟”的标语口号到处可见。

当时我们国家除华东水灾重灾区外的其他一些地方也都有灾，但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顾全大局，克服自己的困难，积极支援重灾省。广东省在连遭台风袭击、救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40天内筹集捐款9000多万元；上海市遭受洪灾后，不仅没向